

現象

鍾雨

七七及七八年的中國（包括香港台灣國內）是夢醒和反芻的一年。不同的政治氣候所帶來的不同的，新的文化現象終於出現了。國內四人幫的思想禁錮在表象上得到解除，貝多芬、莎士比亞、巴爾扎克、甚至愛因斯坦重新獲得起生，楊門女將、搜書院、劉三姐，以至浪漫活潑的大鬧天宮都相繼解禁，我們能不歡呼，恩澤重臨，不竟是福，過去十一年來，誠如最近歸國時一個幹部所說：「中國在文化、經濟的領域足足停頓了十年多。」看一看，張樂平描寫抗日戰爭前上海支離破碎的社會生活的「三毛流浪記」就賣了三十萬本，如果再多印一點，訂價更平一點，銷約千萬冊絕不是問題，人民精神的飢渴，推動了國內的文化復興，單看國內最近出版的著作，重要的就有外國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和文革期被打倒為毒草的無數作品（包括很多電影在內），巴金、秦牧、臧克家等一班年事已高的老作家被重新肯定，一個接着一個的文化喜訊，真沖擊得我們頭昏目眩，看最近上演的電影「祝福」，心裏不禁起了一陣悲愴，不竟中國還有如此的好電影，由文學原著到電影的神韻移植角度來看，本片是極成功之作，然而一算，「祝福」又是二十年前的作品了，中國現在面臨「新時代新任務」是需要重新做起，培養大量文化接班人，文化從來就只有在「繼往」的基礎上才可以「開來」，一個誠懇的年青文化工作者，總是本能地從自己或外族的過去和當代文化資產中，吸取滋養，然後逐漸成長，肯定中國人民是世界人民的一部份，排除四人幫的變態排外，懼外心理，和盲目反對中國的豐盛文化遺產的心態，重新肯定文化，國內政府的確走對了第一步。

中國現在要走四個现代化的道路，中國人民就不能有「反現代化」的頭腦，科技固然要現代化，農業、國防、工業都要現代化

化，人民有真正的參政權，對政府的監管權，起碼的言論自由，都必需被肯定，新時期的新任務，中國必需樹立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國家形像，大量重印舊的文學作品，解禁舊的文化果實，只是起了補充作用，新的、當代的、真正的反映現階段社會現象和本質的電影、戲劇或文學、哲學著作，應該大量湧現，因為他們起着「創造的作用」，社會發展永遠向前，任何文化事業都應該符合社會進步規律，這樣才顯得有價值。現階段的中國，絕不是地獄，亦不是什麼天堂，七十年有七十年代的問題，社會主義有中國社會主義的問題，巴金的「家」「春」「秋」只能作為歷史文學看待，張樂平描寫的是幾十年前的社會寫照，我們不能就此滿足。歷史已經告知了我們，敢言和誠懇的文化工作者，才是國家的瑰寶，霸氣和沒骨氣的文人，永遠是人民和國家之敵。讓我們有良心的讀書人去提醒政府，重事革新，廣開言路，開放政權，亦是近一二年來台灣一班有社會感和歷史感的知識份子所力爭的目標。七二年之前，亦即釣運以前，支配台灣人民的意識形態的，以「現代主義」作為典範，那時候，人人「存在」「純美」「虛無」釣運以後，寫實主義重新抬頭，小市民的生活，成了關心的對象，知識份子在協助，分担民衆為改善生活而作出的掙扎和奮鬥，却招來了親政府文人如彭哥的指責，其中最使人莫名其妙的指責莫如說：「描寫大眾的現實」生活但不是一種「正確」的反映，有着惡化社會內部矛盾的傾向。社會出現矛盾，有勇氣去面對現實，才是科學的態度，中國古人說：「道在邇」，痛了便叫，有不平，才會鳴，不敢觸摸任何事物的本質，這樣只能培養不能面對現實，沒有判斷能力的奴才，如果台灣海峽兩岸都是這樣，可謂民族的大隱憂。

回到香港，我們面對的問題當然又截然

不同，台灣知識份子要抗拒的崇洋心態的行動，在香港便不構成嚴重問題，可能香港的消息傳播，很多時沒有封鎖的原故，致最富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以致偉大的祖國，都有不少黑暗面的報導，理性的市民當有所領悟，對任何一種文化現象的沒有原則性的接受，是完全膚淺和惹笑的，這當然不包括部份智力低沒有辨別能力或有反科學的宗教或狂熱份子在內。香港畢竟有最多的人身自由，雖然新資本主義是控制現階段市民的意識形態的主力，但市民仍各適其適，表現出來的文化現象，多得數不勝數，相信街頭的報攤可以告知我們一切，人民基本上神經麻木，最恐怖的事只能令人們眼睫毛本能地眨動一下，然後一切回歸平靜，文化層面的活動，基本上仍是「遲鈍」的，知識份子的一切努力有點像卡繆的薛西佛斯神話意味，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看一看青年文學獎的情況，成績每況愈下，百多人出席的結構主義符號學座談會亦只弄得惹笑收場。「金禧事件」似乎帶來一陣社會運動復醒的喜悅，但勝利主義是普遍人心滿意足的表现，推動社會改革，畢竟是雷聲大，雨點小。明報集團的文化招牌，是現時香港本地出版業「自由陣營」中最叫座的。可惜社長為首的社論以至過半的有影響力的作家都有傳播偏面的言論。香港左派在面對後四人幫的文化復醒現象，顯得有點手忙腳亂，文匯報的改換字體和新晚報急不及待的大講時裝、化粧社交等表現，顯示其從新打入本港社會各基層的決心，可惜前者的改換，根本不必要，而後者為代表的表現，亦操之過急，佳視的倒台，是最明顯的官商操持文化娛樂事業的教材，一班有理想、有學識的年青知識份子，在「失去」的同時，當然亦得到不少其他的東西，這也可能是他們反芻自己在這新資本主義的香港社會，應該重新扮演什麼角色的時候了。